守望者
The Catcher



# 众生家园

## —— 捍卫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

##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美] J. 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 著
薛富兴 译
卢 风 陈 杨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这个地球可能是我们所有存在物所共有的唯一家园**
**倡导并拓展大地伦理，预见性地涉及当代环境哲学的前沿论题**

- 曾任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
- 耶鲁大学住校生物伦理学家
- 当代北美环境哲学、伦理学代表性学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守望者
The Catcher



# 众生家园

## —— 捍卫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

##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美] J. 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 著
薛富兴 译
卢 风 陈 杨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生家园：捍卫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美）J. 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著；薛富兴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300-26951-1

Ⅰ.①众… Ⅱ.①J… ②薛… Ⅲ.①环境科学-哲学-研究 Ⅳ.①X-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6831 号

**众生家园：捍卫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
[美] J. 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 著
薛富兴 译
卢 风 陈 杨 校
Zhongsheng Jiayuan: Hanwei Dadi Lunli yu Shengtai Wenming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电 话 | 010－62511242（总编室） | 010－62511770（质管部） | |
| | 010－82501766（邮购部） | 010－62514148（门市部） | |
| |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 |
| 网 址 | http://www.crup.com.cn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 |
| 规 格 | 160 mm×230 mm 16 开本 |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张 | 24 插页 2 | 印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 340 000 | 定 价 | 7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谨以此著献给

母亲伊夫琳·E.卡利科特（Evelyne E. Callicott）

父亲伯顿·H.卡利科特（Burton H. Callicott）

# 致　谢



对于整理本文集时所得到的批评性建议，我感谢弗兰西斯·穆尔·莱普（Frances Moore Lappé）、布赖恩·G. 诺顿（Bryan G. Norton）、霍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克劳迪安·卡德（Claudia Card）、艾利斯·范·德伯格（Alice Van Deburg）、威廉姆·伊斯特曼（William Eastman）、大卫·爱德华·沙纳（David Edward Shaner）和尤金·C. 哈格罗夫（Eugene C. Hargrove）。对于撰写本文集之单篇文章时所得到的批评性建议，我感谢理查德·沃森（Richard Watson）、唐·玛丽埃塔（Don Marietta）、汤姆·里甘（Tom Regan）、托马斯·W. 奥弗霍尔特（Thomas W. Overholt）、杰弗里·奥莱（Jeffrey Olen）、阿瑟·L. 赫尔曼（Arthur L. Herman）、弗兰西斯·穆尔·莱普、布赖恩·G. 诺顿、霍姆斯·罗尔斯顿和尤金·C. 哈格罗夫，以及诸多匿名评审人。对于为本文集之整体及单篇文章所得到的文字性帮助，我感谢卡罗里·科特（Carolee Cote）、威廉姆·伊斯特曼、黛安娜·加内利斯（Diane Ganeles）和杰基·雷姆林格（Jackie Remlinger），他们为本文集之出版提供了专业性帮助。

我感谢尤金·C. 哈格罗夫，因为他允许我从他所主编的《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杂志中重印我的以下论文：《环境伦理要素：伦理关注与生物共同体》［"Elements of an Environmental Ethic: Moral Considerability and the Biotic Community", 1 (1979): 71-81］、《动物解放：一项三边事务》［"Animal Liberation: A Triangular Affair", 2 (1980): 311-328］、《休谟是/应当二分法及生态学与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之关系》［"Hume's Is/Ought Dichotomy and the Relation of Ecology to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Leopold's Land Ethic", 4 (1982): 163-174]、《传统美洲印第安人与西方欧洲人对自然之态度：一种概观》[ "Traditional American Indian and Western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 Nature: An Overview", 4 (1982): 293-318)]、《内在价值、量子理论与环境伦理学》[ "Intrinsic Value, Quantum Theor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7 (1985): 357-375]、《评汤姆·里甘之〈动物权利案例〉》[ "Review of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7 (1985): 365-372] 和《生态学之形而上学内涵》[ "The Metaphysical Implications of Ecology", 9 (1986): 300-315]

《作为教育者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论教育，及其当代环境教育语境下之大地伦理》( "Aldo Leopold on Education, as Educator, and His Land Ethic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首次发表于《环境教育》[*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4 (1982): 34-41], 由赫尔德雷弗出版社 (Heldref Publications) 1982 年出版，社址为华盛顿特区大街 4000 号 (4000 Albemarle St., N. W., Washington, D. C., 20016)。此次重印得到了海伦·德怀特·里德教育基金会 (Helen Dwight Rei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的许可。

我感谢马克斯·施内普特 (Max Schnepf) 允许我重印《利奥波德之大地审美》("Leopold's Land Aesthetic"), 美国水土保护学会 (Soil Conserv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83 年版，该文曾发表于《水土保护》[*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38 (1983): 329-332]。

《论非人类物种之内在价值》( "On the Intrinsic Value of Nonhuman Species"), 首次发表于布赖恩·G. 诺顿主编的《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The Preservation of Species: The Valu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 138-172)。此次重印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许可。



《大地伦理之观念基础》(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he Land Ethic"), 首次发表于 J. 贝尔德·卡利科特 (J. Baird Callicott) 主编的《〈沙乡年鉴〉手册：阐释与批评论文》(*Companion to A Sand County Almanac: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Essays*) (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7: 186-217)。

《伦理关注与外星生命》（“Moral Considerability and Extraterrestrial Life”），首次发表于尤金·C. 哈格罗夫主编的《超越地球飞船：环境伦理学与太阳系》（*Beyond Spaceship Earth: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he Solar System*，1986）。此次重印得到了西拉俱乐部出版社（Sierra Club Books）的许可。

# 目　录


致　谢　1

导论　真正的工作　1

## 第一编　动物解放与环境伦理学

第一章　动物解放：一项三边事务　15

第二章　评汤姆·里甘之《动物权利案例》　38

第三章　动物解放与环境伦理学：重归于好　47

## 第二编　一种整体主义环境伦理

第四章　环境伦理要素：伦理关注与生物共同体　61

第五章　大地伦理之观念基础　72

第六章　生态学之形而上学内涵　97

## 第三编　环境伦理学之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论

第七章　休谟是/应当二分法及生态学与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之关系　115

第八章　论非人类物种之内在价值　126
第九章　内在价值、量子理论与环境伦理学　153

## 第四编　美洲印第安人之环境伦理学

第十章　传统美洲印第安人与西方欧洲人对自然之态度：
一种概观　173
第十一章　美洲印第安人之大地智慧?：澄清论题　198

## 第五编　环境教育、自然美学与外星生命

第十二章　作为教育者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论教育，及其当代
环境教育语境下之大地伦理　217
第十三章　利奥波德之大地审美　232
第十四章　伦理关注与外星生命　242

注　释　260
索　引　330
译后记　361

# 导论　真正的工作[1]

## 一、环境哲学：起源与类型

当我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一所大学得到我的第一个职位时，我便满怀热情地开始了我的哲学生涯。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特别是在学院与大学的校园里；那也是一个危险的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南部，我在那里找到自己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对一位理想主义的青年学人而言，当时正有三种严重的社会现象，既作为挑战也作为机遇矗立在人们面前：民权运动、和平运动与环境运动。对我而言，这三者中存在最大哲学机遇与智慧挑战的，似乎就是被称为“安静的危机”［quiet crisis，此乃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Udall）的著名用语］之环境危机。



我被卷入美国南部的民权运动与和平运动，未能得到当时雇主的理解。所以，1969年，我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中部沙县找到一份新工作。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正在兴起的生态意识（ecological consciousness）与良知（conscience）的精神中心。

环境保护学院（School of Conservation）［即现今之自然资源学院（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为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斯蒂文斯点（Wisconsin State University-Stevens Point）［即现今之威斯康星-斯蒂文斯点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铸造了鲜明个性。加盟该校之哲学系不久，我即建议开发一门全新的、叫“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的课程。它被设想为一门可以吸引大多数森林、野生物管理，及其他相关专业学生的课程，亦可额外允许我拓展如此预

感：生态学（ecology）是一个蕴含着许多革命性哲学观念的宝库。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界少数其他学人也在不同地方推出类似课程。因此，起初，环境哲学仅仅是学院与大学周日课程中的一种相关物，有常任教职的哲学家们在这些学校纯属偶然地被激发开设和教授这门课程。在环境哲学家中没有或很少有一个共同体，直到尤金·C. 哈格罗夫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创办了《环境伦理学：环境问题之哲学方面的跨学科期刊》（*Environmental Ethic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该刊于1979年创刊）。

自此，我们这些曾相对孤立地在此领域工作的人对于什么是环境伦理学与环境哲学开始形成一些很不相同的观念。有些人将它理解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就像生物医学伦理与企业伦理所做的那样——这二者也产生于大致相同的氛围与时期。[2]据此，新的、奇异的技术——像核动力与遗传工程——已给人类带来新的、奇怪的环境危险。对此，以前的人类道德哲人未曾想见（或者，当代领先的元伦理学家们并不准备屈尊关注）。所以，环境哲学的任务便是将环境哲学家们自己喜欢的标准的道德理论——康德的道义论（deontology）、边沁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密尔①的功利主义、罗尔斯的正义论等——应用于由新技术所造成的新的伦理困境，这些新技术已如此剧烈、危险地改变了“人类的”环境。由于西方道德哲学已然压倒性地（若非全部地）属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亦即排他性地聚焦于人类的利益与人类的内在价值（或人类的经验），所以环境进入伦理学（如此视野下的环境伦理学）仍属于人类相互活动的领地。可以说，环境被如此对待：在人类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间，它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向量。

将环境伦理学想象为一种应用伦理学，环境伦理学通常便是问题导向的。比如，学者们可能关注燃煤电器与其他使用或制造烟囱的工业所造成的酸性气体问题，努力找出谁应当因酸雨问题而受到谴责，以及如何对那些其“自然资源”已然受损的人们做出公正的补偿。或者，学者们可能会关注核设施的处所，以及以不公正、不自愿的形式将危险强加于一个国家

① 又译作“穆勒”。——译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不同人群所引发的伦理问题。除了显然的伦理问题，像酸雨与核电站选址之类的议题还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如人们对阳光中悬浮物的反应，以及低水平辐射扩散所造成的致癌潜在威胁问题）、复杂的经济问题（如工厂除尘的成本效益，以及确定每一美元旅游收入的准确增值因素），以及复杂的国际法与公共安全问题。

其他环境哲学家担心：在人们关注此类困惑时，如规则、平衡、表格、图表、合法技术，以及有关环境议题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平等主义等理论的相对伦理优势，更为深层的哲学问题，诸如自然环境自身的价值，以及我们对自然本身的责任（若有的话），却被忽略了。他们觉得，若环境伦理学仅满足于将西方的规范伦理理论应用于新的、复杂的环境议题，将此理论做一种新的应用，那么最基础的伦理问题在环境伦理学中就将没有地位。这些环境哲学家将致力于拓展传统的西方伦理理论，他们将非人类存在物纳入伦理学的直接受益者之中。[3]然而，传统西方伦理理论的弹性是有限的，因此，最合理的拓展至动物而终——甚至并非所有动物均被包括在内。[4]被设想为对道德的增加性拓展，能够超越物种界限的环境伦理学便因此而与动物福利伦理学（animal welfare ethics）高度一致——作为“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而高度知名。[5]

与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环境伦理学相同，动物解放牢固地附属于主流现代西方伦理理论的途径与手段；但是它又与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环境伦理学不同，它并不聚焦于环境议题的复杂技术、经验与政治方面，将环境伦理学视为可靠、真实道德法则的应用舞台。其核心关注是：如何通过熟悉的伦理推理方法，将传统伦理理论的首要原则最好地拓展至更宽泛的道德客体。因此，动物解放有一个决定性的理论维度——使自己更具哲学特性，以区别于那些将哲学、公共政策、经济学、工程学以及环境科学等量齐观地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学科。

一位拓展主义者（extensionist）也许会始于一种他或她喜欢的传统伦理理论——康德的道义论、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功利主义、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其他，并追问如何能将这些理论拓展至非人类存在物，通常是指其他脊椎动物，将它们置于人类伦理关注的保护伞之下。或者是一种相反的思路，一位拓展主义者可能始于一种道德直觉：某些动物，也可能

是其他生物，应当被置于伦理关注的视野之下，并追问在西方道德哲学的可用选项中，哪一种理论可为此提供最有前景的理论原则。

环境哲学家的第三个分支通过对现代西方文明对自然的态度与价值观这样一种环境本身的反思，从环境危机中发现了一种从事深度批判的可能。因此，它不逊于任何一种广泛的哲学审查——需要反思的不仅是伦理学，还有整个西方世界观。这些哲学家，我把自己算作其中一员，已被称为“生态中心主义者”（ecocentrists），因为我们提供如此转变：将内在价值之中心从个体（无论是个体人类，还是个体高级“低等动物”）转向大地自然（terrestrial nature）——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ecosystem）。[6] 与拓展主义者相同，生态中心主义环境哲学家更关注认知性，而非技术性、经济性与政治性问题；但是，与拓展主义者不同，生态中心主义环境哲学家更关注批评，而非拓展传统西方道德哲学（以及形而上学）。我们的目标是从基础上建立新的伦理学（以及形而上学）典范。

我相信有人会说，这是一个更为广泛、富有野心且自命不凡的环境伦理学观念，它似乎是一种最为激进的环境伦理学观念。即便如此，从一种甚至更为极端的角度看，它又相对保守：一方面，更激进者仍属自我立异的深层生态学家；另一方面，亚洲学者以及比较哲学家们建议，哲学自身及其理性的方法无论如何乃当代环境问题之一部分，而非该问题之解决方案。[7] 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家们像维特根斯坦的苍蝇（Wittgenstein's fly），仍在瓶子里——若我们想象自己能想出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他们会表示同意。[8]

从另一角度讲，环境伦理学的生态中心主义方法是保守的甚至古典的：它将哲学召回到其在西方文化史中已被放弃的地位与作用中。20 世纪哲学已从物理学的嫉妒中饱受痛苦。20 世纪学院派哲学家已然追求为他们自己标出一片智力赛场（在此之前，所有其他领域已然为各门类科学所占领），将自己用一种神秘的、充满行话的、象征性的自我表达模式武装起来，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结果，哲学家们日益自我孤立，与更大范围的智力共同体不再相关。随着 20 世纪落幕，哲学已成为最琐碎、学究气最重的学科之一。

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正以令人眩晕的节拍变化着。全球

景观已完全机械化，充斥着各式合成物。全球人口数量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增长三倍。物种灭绝事件正在我们的鼻子下发生，其速度与数量堪比恐龙的消失。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依地质学时间计量尺度即眨眼之间，人类光临地球时尚存的地上物种已有十分之一灭绝。物理科学已然探测到宇宙的边缘、时间的起点，并将深入物质的最精微结构。在此探测过程中，我们关于空间、时间、物质、运动，因此以及我们知识的性质等的基本观念，已然发生巨大变化。

对哲学家而言，今天，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大的需求，去做我们先辈曾为之事——重新刻画世界图景，以回应彻底改变了的人类经验和从科学中喷涌而出的崭新信息与观念之流，探讨我们人类可能以什么样的新方式想象自己在自然中的地位与作用，勾画出这些伟大的新观念可能如何改变我们的价值，重构我们的义务与责任感。



## 二、奥尔多·利奥波德：开创性环境哲学家

在20世纪，其他思想家已部分地填补了由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哲学家们的偏见所造成的思想真空，后者热衷于一些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的特殊问题，也远离自苏格拉底以来激发西方思想家的基本问题。然而，另一些人则出人意料地登场了。他们是艾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本杰明·沃夫（Benjamin Whorf）、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阿兰·沃茨（Alan Watts）。最近者则有加里·辛德（Gary Snyder）、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R. D. 莱恩（R. D. Laing）、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卡尔·萨根（Carl Sagan）、弗里特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E. F. 舒马赫（E. F. Schumacher）、威廉姆·欧文·汤普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弗兰西斯·穆尔·莱普、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便是这样一位业余思想家。作为一位富有思想性与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森林管理者，利奥波德致力于在亚利桑那（Arizona）与新墨西哥（New Mexico）捕捉游猎（game）、树木、山川、河流与土壤的动力学（dynamics）。[9]他对土地的理解因生态科学而成熟。依利奥波德的整体性思想，生态学既非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科学，又非仅仅是为高效率开发自然资源而产生的一种工具与信息库。利奥波德以自身广泛的田野经验证明，生态学是一种感知与认知性把握自然界的有深度的新方式。此外，随着对生态学的理解加深，利奥波德发现自己的自然观念发生了改变。因此，他提出，生态学亦将孕育深刻的伦理法则。

但准确地说，由于利奥波德对历史与哲学方法的熟悉仅相当于获得初步教育的绅士水平，所以，无论他如何确有洞见，其文字对生态学形而上学与价值论内涵的表达都并不完善。利奥波德的简约文字风格使其生态哲学显得更加朦胧。他喜欢直接、精粹的散文。利奥波德的哲学文章简洁明快，极少长达十多页。其《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乍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其中利奥波德高度浓缩的生态学视野本质的表达并非不得要领，像一位学院派哲学家所可能的那样；而且，随着描述、示例、图表分量的逐渐积累，其概要性论点最终出现在该著之高潮性篇章——《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之中。

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初次与利奥波德的这部作品相遇时，从中发现了对当代环境伦理学而言恰如其分的东西。作为上述第三种环境哲学家，我觉得，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正是一块试金石、一部开创性经典著作。我愿意充实其观点。利奥波德本人仅仅提出这些观点，我愿意将他的这些观点（特别是其伦理学观点）与西方哲学史上那些可以对他富有内涵的文字做出回应的先贤的观点联系起来。

通过本文集所收之论文，在近十年的时间中，我致力于更全面地拓展、阐释、历史化与捍卫“大地伦理”（land ethic）。我的几位同事与朋友劝我将它们汇为一册，不只为了方便，更是因为它们在主题上有关联，合起来可以呈现一种统一的环境哲学。

如此所示，我已将这些论文依论题分类。于每一论题内，论文呈历时排列。这样，每一论题内的论文将以平行方式展示。我已然抵制了那种对

论文做实质性修改的诱惑。在将论文收入本文集时，我补充了一些，润色了一些，特别是对早期那几篇。在不同的地方，我在风格上做了轻微的修改，或在付印时校正了一些拼写错误。由于每篇论文曾各自独立，将它们汇为一集就难免有交叉与重复。但是，对本文集之整体思想框架而言，每篇论文各有独特贡献。

## 三、论文之结构与诸机缘

第一编。我的工作可能与对动物解放/权利之环境批评关系最为密切，故而我可能因对动物福利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所做的区分而最为知名。无论如何，首次发表于 1980 年之《环境伦理学》的《动物解放：一项三边事务》一文是我最著名——或最败名——的文章，这要看你如何评价。在此次印行时，这是一篇我最想修改（审查）的作品。它曾有意挑起争论，也确实引起了争论。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与汤姆·里甘的勤奋和哲学上的敏锐，拓展主义（extensionism）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似乎全面接管了环境伦理学。对我而言，争论似乎变得日益两极化——只发生在“人类中心主义者”（anthropocentrists）[我称之为“伦理人文主义者”（moral humanists）] 与动物解放主义者（animal liberationists）[我称之为“人文道德主义者”（humane moralists）] 之间。我想将注意力吸引到对我来说似乎是被忽略了的争论的第三方。这是一种更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它得到了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经典拥护。我在此方面也很成功。它对我而言特别重要，因此这不仅使我有机会将它收入本文集，与其他更温和地、考虑得更周到地阐释和推演利奥波德大地伦理的文章并列，而且使我有机会将它与我那些更温和地、包容地描述动物福利伦理学的文章放在同一编。

重建沟通上述三者的桥梁——此三者间的争论亦因我而起——之进程始于我对汤姆·里甘之著作《动物权利案例》（*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的评论，评论文章发表于 1985 年的《环境伦理学》。虽然该评论对里甘于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之反击提出批评，但它在结尾时提出了

一种思路：对动物福利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进行理论上的重新整合。在《动物解放与环境伦理学：重归于好》（“Animal Lib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Back Together Again”）一文中，我力图将在评论里甘时所建议的重新整合动物福利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工作贯彻下去。该文曾在伦理研究学会和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于1988年3月在俄勒冈州（Oregon）普特兰市（Portland）联合举办的一次关于动物的会议上宣读，随后同年发表于《物种之间》（*Between the Species*）杂志。这三篇关于动物解放/权利与环境伦理学的文章构成本文集之第一编。

第二编。在这一部分，我以利奥波德之大地伦理为基础拓展出一种整体主义环境伦理（holistic environmental ethic）。本编第一篇——《环境伦理要素：伦理关注与生物共同体》写于1977年，我曾应邀于威斯康星哲学学会宣读了这篇论文，并将其发表于《环境伦理学》创刊号。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的关注点，用专业性的、受尊敬的词语表达——逻辑符号与一系列命题——完善了利奥波德之大地伦理的基本原则。

本编第二篇——《大地伦理之观念基础》写于1985年，它代表了我在全面、系统地澄清利奥波德之大地伦理的认知因素与逻辑方面的最佳努力，即用哲学话语全面地呈现大地伦理。它被收入了《〈沙乡年鉴〉手册：阐释与批评论文》。这是一本由十位作者撰写、十二篇文章组成、由我编辑的文集，由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以纪念利奥波德诞生一百周年。



本编第三篇（收尾之作）——《生态学之形而上学内涵》，宣读于由亚洲与比较哲学学会和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于1986年在华盛顿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随后同年发表于《环境伦理学》的一个以“环境哲学的亚洲传统思想观念资源”为题的专刊［它与《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杂志的一个补充性专题相配合］。此文在最广义的认知范围内，将利奥波德之大地伦理定位为一种系统的生态学/量子理论之范例，大地伦理在此意义上作为一个象征始有其根基。

第三编。大地伦理的两个最具革命性的特征是：其一，从强调部分到强调整体——从个体到共同体；其二，从强调人类到强调自然，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前者是本文集第二编的主题，后者则构成本文集第三编的主题。伦理整体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分别代表了，也同等地标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